长征故事传播与上海(上)

◆ 朱少伟

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红军战胜无数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爬雪山,过草地,挫败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体现了无与伦比的英雄气概,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英雄业绩。这一伟大壮举最初见诸报刊和书籍,受到全球的关注,与上海有着密切的关系。

▶ 陈云的《随军西行见闻录》版本之一《红军长征随军见闻录》

陈云在黄浦江畔挥笔写书

长征被西方学者称为“历史上最盛大的武装巡回宣传”和“激动人心的远征史诗”。然而,最早向世界进行宣传的是陈云。

长征之前,陈云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红五军团中央代表。1934年10月,陈云随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从江西出发,踏上漫漫长征路,先后担任军委纵队政委、渡河(指金沙江)司令部政委等职。经过四渡赤水、突破乌江、抢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等艰难历程,部队于翌年5月31日抵达四川泸定。当晚,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和陈云等出席。会议决定由陈云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前往上海领导恢复白区党的组织,设法与共产国际联络并报告长征及遵义会议的情况。不久,在中央红军将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之际,陈云装扮成商人模样,悄悄离开了部队。

1935年7月初,陈云辗转来到黄浦江畔,用自己在中央特科工作时的化名“李介生”登记投宿上海天主堂街(今四川南路)新永安旅馆。由于在1934年6月后中共上海中央局接连遭到三次破坏,无法立即取得联系,陈云就打电话给上海浙江实业银行副总经理章乃器,从而找到了中共地下党员章秋阳。

陈云逗留申城期间,除了努力开展党的秘密工作外,还抽空核对相关资料,准备给共产国际的一个报告;而且,还挑灯夜战记下长征中许多难忘的情景,初步形成一部叙述长征的书稿。

7月下旬,中共上海中央局和江苏省委再次遭到严重破坏。在章秋阳的协助下,陈云几经周折与在申城的中央特科取得联系,接着又见到从香港返沪的中央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部长潘汉年。随即,中央特科传达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来电:鉴于上海环境十分险恶,请陈云等尽快赴莫斯科。

9月上旬,陈云秘密乘坐一艘苏联货轮前往海参崴,再从那里乘火车去莫斯科。10月15日,陈云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作报告,讲述红军长征的前期情况,并指出:长征取得成功的原因,一是兵心团结,二是受到民众帮助,三是拥有一批“非但聪明,且有才能”的领袖。这份报告被整理成文,冠以《英勇的西征》标题,署名施平(陈云化名),在翌年春发表于《共产国际》杂志(中文版)。在世界革命阵营内,它是最早宣传长征的重要文献。

陈云还把从上海带去的书稿进行整理,形成约4.5万字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在1936年3月至4月,《随军西行见闻录》署名“廉臣”,发表于巴黎华侨组织主办的中文杂志《全民月刊》;翌年夏,它又由中共在巴黎创办的《救国时报》连载。陈云的《随军西行见闻录》,首次戳穿敌人制造的红军“逃窜”谎言,使各国人民开始了解红军的英勇事迹。

《随军西行见闻录》起初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很快又以《从东南到西北:红军长征时代的真实史料》《红军长征随军见闻录》《长征两面写》等书名在国内出版,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宋庆龄帮助斯诺赴陕北采访

1937年10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由英国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他根据自己在陕北的所见所闻,用比较多的篇幅谈论了长征。

当年,在华的西方记者至少二三十人,为什么只有斯诺首先如愿以偿顺利赴陕北采访呢?在很长时间里,斯诺一直没有公开其中秘密,直到20多年之后,他才在另一本著作《旅行于方生之地》中透露是“孙夫人安排我访问红区”。

1928年夏,斯诺远涉重洋来到上海,经过母校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威廉斯推荐,担任上海出版的英文周刊《密勒氏评论报》编辑。1933年春他携妻子赴北平,应聘为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并相继担任美国《星期六晚邮报》驻远东撰稿人、纽约《太阳报》记者及英国《每日先驱报》特派记者。

宋庆龄初次会晤斯诺,是在1931年。这年9月,斯诺按照纽约《先驱论坛报》的要求,为了写一篇关于宋庆龄的人物传记,在上海专门采访她。

斯诺通过与宋庆龄等的交往,逐渐了解在中国西北黄土地上活跃着为世人称道的红军并产生浓厚兴趣,他最终决定接受英国《每日先驱报》和出版公司的稿约,争取赴陕北采访。1936年春,斯诺又一次到上海拜望宋庆龄时,谈出了这个想法,请求她给予帮助。宋庆龄听后,欣然表示同意。不久,宋庆龄获悉中共中央希望邀请一名公正客观的西方记者和一名医生赴陕北考察,她就推荐了斯诺和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即马海德)。6月3日,斯诺乘火车从北平出发,第二天在郑州车站与乔治·海德姆会合,两人遂结伴同抵西安;在宋庆龄委托的“王牧师”(即董健吾)照应下,他很快得以带着用隐形墨水写的介绍信函、两架相机、24个胶卷和足够的笔记本,乘东北军的卡车进入陕北。斯诺来到保安(今志丹县),周恩来在接见时说:“我接到报告,说你是一个可靠的新闻记者,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要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从7月初至10月中旬,斯诺对陕北作了广泛而深入的采访。

斯诺“带着一打日记和笔记本,30卷照片,还有好几磅重的红军杂志、报纸和文件”返回北平后,很快写出稿件寄给《密勒氏评论报》。1936年11月14日、21日两期《密勒氏评论报》,予以全文发表,题目为《与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会见》。与此同时,斯诺也相继为别的英文报刊撰了一些相关报道。在此基础上,他写成《红星照耀中国》,该书陆续被译成10多种文字;1938年2月,上海复社也出版它的中译本,为了便于流传将书名译作《西行漫记》。后来,书中关于长征方面的内容,被上海文孚出版社编为《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国人民解放军突围史实》。

《文摘》介绍第一部长征回忆录

1937年夏,上海复旦大学文摘社出版的《文摘》第二卷第二期(卢沟桥浴血抗战特辑),曾发表记者任天马在陕北采写的《集体创作与丁玲》,其中丁玲这样说:“在这里可以比在外面更自由些,更有趣些,没有什么拘束。也许正是因为这里一切都不受拘束,集体创作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记》乃得写就了它的初稿。”它披露了第一部长征回忆录的编辑珍闻。

原来,斯诺到陕北采访期间,毛泽东认为这是向外界宣传红军的好机会。所以,在1936年8月5日,他与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联名致函参加过长征的同志:“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

在此号召下,大家纷纷开始撰写回忆录。截至同年10月底,征集到了大量稿件。红军总政治部成立编辑委员会,准备编辑长征回忆录。

细说孙中山家族

沈飞德

57.拜谒外祖父故居

据中英街历史博物馆馆长孙霄介绍,这些文物是孙婉去世后留给女儿戴成功的家产,非常丰富,包括瓷器、青铜器、玉器、景泰蓝、银器、骨雕、珠宝、水晶器、信札、证件、证章、家具、服饰、刺绣、老照片、艺术灯具等20多个种类。其中有保存完好的孙中山家族的原版照片,真实反映了孙中山亲属与后裔在澳门的生活情况;一枚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币是1912年返回澳门时带给卢慕贞作纪念的。孙婉丈夫戴恩赛生前喜欢收藏古董,有部分是他生前的藏品。这些文物的流传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孙婉一家悲情的一面。它是由卢慕贞传与女儿孙婉,孙婉又传与女儿戴成功,最后由孙婉的干女儿司徒倩继承。其间,戴成功除向宋庆龄基金会捐赠过一批文物外,因生活拮据,曾委托司徒倩在澳门开过一家“成记古董店”,托人代售了一批古董,以贴补家用。据媒体报道,司徒倩捐赠深圳的孙中山家族文物,只是她从戴成功那里继承的一部分。她还曾向海内外多家档案馆、博物馆等机构捐赠文物。

2012年12月,她把最后一批文物捐赠给澳门博物馆。她晚年写有《孙婉回忆录》(未刊稿),是一份了解戴恩赛孙婉夫妇和孙氏家族在澳门生活的珍贵史料。孙婉长女王缵蕙2004年2月9日在台湾去世,享年89岁。

王弘之是孙中山在大陆的唯一嫡亲外孙。他1942年毕业于沪江大学文学院政治学系,著有《民国政治制度史纲要》。上海解放后,先后担任华东区外贸管理局宣教干事、上海海关宣教干事、上海海关学校筹备委员、政治教师、上海外贸子弟中学教导主任兼历史教师、上海对外贸易学院预科校务委员。他长期从事语文教学,经验丰富,1962年起先后在上海财经金融学校、上海财贸学校、上海银行学校任教,是上海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图书馆负责人、副教授,1989年12月退休。他于1980年7月参加民革后,当选民革上海市第七、八届委员,民革上海市委学习委员会副主任等职。他还担任上海中山学社理事、宋庆龄研究会理事,发表《略论孙中山政法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等论文。

1996年8月,王弘之率全家前往广东中山翠亨村,拜谒外祖父故居,那是他晚年最快乐的一件事。他精心书写了一幅内容为“钟山千古留正气,翠亨万代振乡邦”的作品赠送外祖父故居纪念馆,落款则为“外孙王弘之拜书”。他曾高兴地告诉笔者,在翠亨村外祖父故居纪念馆中,父亲的照片作为孙中山先生女婿、孙婉第一位丈夫的身份陈列出来;由外祖父侄孙孙满先生主持编纂的《翠亨孙氏达成祖家谱》已经出版,父亲的名字赫然在列。家谱中在述及孙婉时说:“适王伯秋,离异后再适五华戴恩赛。”

1996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三十周年纪念日。王弘之接到全国政协秘书处发来的请柬,邀请他和妻子赴京参加全国政协举办的纪念大会和纪念活动。王弘之第一次参加孙中山先生的直系和旁系亲属的大团聚。那些天,王弘之朝夕与孙氏亲属见面,友好相处,畅叙亲情。给他印象特别深的是,孙科长孙孙国雄说:“你们的血统与孙家是一棵树上的分枝,亲情是永远相连的。”并邀请他和妻子去美国做客,说要亲自去机场迎接。11月12日上午,王弘之和孙氏亲属一起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受到江泽民、李瑞环、朱镕基、胡锦涛、荣毅仁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1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汉斌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王弘之夫妇等孙中山先生亲属。

王弘之晚年与妻子李云霞合著长篇家史,2006年2月又改名《沧桑——孙中山之女孙婉与王伯秋的生死恋情》由北京团结出版社出版发行。2006年6月24日,王弘之在上海徐汇区中心医院病逝,享年87岁。

王弘之去世后,凡遇到纪念孙中山的活动,他的妻子李云霞总会偕儿女一起参加。2011年9月21日,她与次子王志纮受邀参加上海市政协举办的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系列活动。2012年9月18日,李云霞因脑溢血突然去世。

明起连载《傅海澜传》

同和里

王承志

18.毛头的阿爸

是的,毛头被我用煤饼砸在脸上,并没有死,或者说,他死了,但是又活过来了。有句成语就是这么说的:死去活来。

我两天没上学,顾老师也没来家访。她大概是想来的,但是不敢来。夏天的时候,有一次顾老师冒雨来家访。因为落暴雨刮大风,小皮匠也收摊了,赤了膊躺在床上睡觉。得知老师来了,小皮匠慌忙一跃而起,想说几句客气话。小皮匠穿的是一条龙头细布的大裆裤,没有橡皮筋的,属于一二三三叠头裤子,左面拉过来,右面折过去,再中间往里一叠,就束紧了。小皮匠睡相不好,在床上扭来扭去,三叠头松了,人一站起来,裤衩一下子褪到脚背上。他完全吃慌了,忘记赶快采取补救措施,就像一座落地自鸣钟一样戳在地上一动不动。顾老师赶紧别转头,说:“我以后再来家访。”说完就逃。从那以后,顾老师再也没有到我家来过。

小皮匠那几天一直心神不定,对我也客气了很多,还转弯抹角打听学校里的事。他害怕顾老师告他耍流氓,这可是很严重的罪名。我就吓唬他,说顾老师连续几天语文课都没来教,还到校长室里去哭。小皮匠赶忙翻黄历,翻下来的结果大概不妙,只看到他面孔煞白,人都发软了。后来事情穿帮了,小皮匠辣手辣脚敲了我一顿。

顾老师很担心我,又不敢去问小皮匠,问了几个同学,也问不出个所以然。后来见我又活蹦乱跳地来上学了,还带了请假条,也就放心了。请假条是姨婆叫老虎灶里的茶客写的,写在一张香烟壳子的背面,说姨婆生病了,我在照顾服侍姨婆。落款是“大耳朵的姨婆”。顾老师还表扬我懂事体,孝敬老人。

逃过一次,再逃就容易多了,何况姨婆鼓励我逃,说我逃到她那里去,她就烧好小菜给我吃。姨婆太冷清了,巴不得我经常逃,去陪陪她。反正老虎灶里茶客多,总能找出一两个会写字的。每次写请假条的香烟壳子牌子都不同,笔迹也都不同,顾老师却从没发现此中的漏洞。

毛头总是喜欢学我的样。毛头看我经常逃,心痒了,也逃了一次。要说他那次也叫逃,我真要替他难为情得连脚底都要红了。那天他吃了晚饭,没跟家里打招呼,就出去了。他的几个兄妹都在做功课,他妈忙着擦席子洗衣服,谁都没有注意他。毛头在外面逛到八点半就回家了。他妈随口问他去哪里了,毛头厚着脸皮说:“我从家里逃出去了。”他妈听了一点没当回事,说:“你哥那盆洗脚水还没倒掉,还冒热气呢,你快去洗个脚,洗完好睡觉。”毛头失望极了,委屈极了,他满以为干了件了不起的事,家里也应该隆重一点对待他,一气之下又大声吼了一句:“刚刚我从家里逃出去了!”就是在这个时候,毛头的阿爸从棋摊回来了。

毛头的阿爸脸色很不好,他一般都是把带出去的两角钱输完了回来的。毛头的阿爸棋太臭了,在棋摊下棋,只有输的分。我只见到他赢过一次。和他下棋的那个家伙患了眼病,一只眼睛蒙着一个眼罩,走子的时候放偏了,把个车白白地送到毛头阿爸的马口。毛头阿爸高兴死了,怕那家伙反悔,先把那只车抓起来紧紧地捏在手心,再把自己的马放到那里。戴眼罩的家伙后悔得几乎要去跳河,硬生生把头发扯下了好几根。以后这家伙逢人就说这事,从得了眼病开始说,一直说到毛头的阿爸先抹棋再做填充,不厌其烦,从刚开始刮西北风一直说到第二年柳枝爆出嫩芽,比祥林嫂还要祥林嫂。棋摊老板很痛苦,他守着棋摊又走不开,所以眼罩每次说这事,他都在场。棋摊老板说自己被迫听了三十遍,可他那懊丧无比的神情透露,他至少把听的次数少说了七十遍。毛头的阿爸在眼罩那里首开记录,此后再也没有在这记录上面添上一笔。即便如此,每个星期六晚上,他还是照规矩去棋摊上厮杀一番,其实是送上门去伸长头颈被别人斩。要是他十点以后回来,肯定是神情怡然,觉得这钱花得值了;要是八点左右回来,肯定是面色铁青。有次毛头的阿爸回家后又急匆匆地走了,过了一会又脸色阴沉地回来了。毛头不会看山水,懿头懿脑地上去问:阿爸,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毛头的阿爸撩起就是一记耳光。